

主题讨论：能源安全与中东能源政治

当人类社会能源利用走过薪柴时代、煤炭时代，步入石油时代之时，以石油为主体的能源愈加成为现代经济的基石，是国家崛起与复兴的重要前提。不仅如此，基于油气资源的天然稀缺性以及全球能源分布、供需在地理空间上的不平衡性所造成的油气经济要素的分离，加剧了国家内部与国家之间的竞争与合作。从经济活动、政治决策到国家安全，乃至国际关系，石油的独特价值和政治属性无处不在，能源因素凸显为影响国家经济与国际关系演进的关键参数。当下，中东地区从北非到西亚诸国，地区政局剧变的溢出效应亦波及到石油生产与国际油价，加之“页岩气革命”影响着国际能源格局。那么，在此情境之下，业已成为全球油气市场供应核心地位的中东地区现位居何处？产油国或国家集团又何以通过石油财富和权力展开能源政治与能源外交的？

本期专题论文的首篇就直面非常规油气资源开发引致的世界石油新版图，作者通过扎实的分析论证，回答了3个重大现实问题：美国能源供应格局是否会发生根本性变化？中东对美国的战略重要性是否会因此而降低？中东在全球能源市场的位势如何变化？本文对上述问题的研究具有相当启发性。刘冬的论文纵观欧佩克石油政策的发展演变，分析了其对国际油价的影响，结论是“与其说欧佩克是国际油价的引领者，不如说它更像是国际油价的跟随者”。刘云的文章选取石油在利比亚重建中的作用作为论述对象，论及石油对于利比亚重建的重要作用、利比亚过渡政府的石油政策、西方石油公司的争夺以及中国同利比亚石油开发合作等问题，本文对于研判利比亚未来国家发展及油气开发市场颇具价值。姜恒昆、付海娜的论文梳理了苏丹近50年发展的裂变史，由此透视出该国内政与大国引发的石油地缘政治的争夺。陈沫的论文立足于中东地区及世界能源格局的新变化，结合中国石油对外依存度高的特点，指出未来中国依然会倚重中东能源供应，但扩大能源来源多样化、积极发展新能源，尚可维护中国能源安全。

叙利亚危机的根源及未来政治生态*

姚大学 闫伟

内容提要 叙利亚自爆发危机以来冲突不断加剧，并日趋陷入内战。这场危机爆发固然有外部因素作祟，但更多源于叙利亚内政外交的缺陷：巴沙尔实行的经济和政治改革非但未能挽救复兴党政权，反而激化了社会矛盾，削弱了统治基础；阿拉伯政治认同具有的传导性，以及亲伊朗外交政策使叙利亚遭到西方国家和海湾国家孤立。从长期来看，叙利亚政治版图将出现“碎片化”的趋势，尚无一派政治力量可以独揽大权。叙利亚各派可能在伊斯兰化还是世俗化、联邦制还是单一制，以及库尔德人权利等问题上交锋，共同绘制叙利亚政治图景。叙利亚的未来不只决定于能否创制出适合国情的制度和民族和解，更决定于国际社会的作用。

关键词 叙利亚危机 巴沙尔 政治生态

作者简介 姚大学，内蒙古民族大学世界史研究所所长、教授（通辽 028000）；闫伟，西北大学中东研究所博士生（西安 710069）。

2010年岁末，始自突尼斯的中东政治动荡潮很快波及到叙利亚，使其陷入严重的政治危机。当不少阿拉伯国家出现政权倒台乃至开启新一轮政治重建之时，叙利亚危机仍处于胶着状态，成为当前中东地区最令人瞩目的热点问题。国内外媒体乃至学术界对叙利亚危机进行了热烈的探讨，焦点大多集中在巴沙尔政权能否支撑得住、能够支撑多久、欧盟与美国能否出兵等问题

* 本文为中国社会科学院西亚非洲研究所哲学社会科学创新工程项目“中国对中东战略和大国与中东关系”的阶段性成果。

上。研究这些问题固然对于了解叙利亚危机的前景走势具有一定的意义，但是，从社会历史发展的深层次考察，进一步探究叙利亚危机的根源以及叙利亚未来的政治生态问题可能更有助于掌握叙利亚危机的未来发展趋向。本文拟就这些问题进行初步探讨。

叙利亚政治危机的发展现状

自2011年3月危机爆发以来，叙利亚政局持续恶化，迄今大致经历了3个发展阶段。

第一阶段为和平抗议阶段。2011年3月18日，叙利亚南部的德拉市(Dara'a)爆发大规模民众示威游行，要求结束复兴党统治、废除1963年通过的“紧急状态法”、增加工资和社会补助等。抗议运动迅速蔓延至中部城市霍姆斯和哈马。巴沙尔政府动用军队镇压抗议运动，造成大量平民伤亡。同时，巴沙尔也积极进行改革，宣布废除“紧急状态法”和国家安全法庭、释放政治犯、放松对媒体控制、进行民族对话、实行多党制、提高库尔德人地位、改善民众生活等。2011年7月，巴沙尔政权已重新控制了叙利亚中部和南部的城市。这些举措使叙利亚局势暂时平缓，但并未根本解决国内政治危机。

第二阶段为叙利亚反对派逐渐成势、国际干预增多阶段。2011年8月之后，叙利亚国内局势再次紧张，不仅多个城市爆发要求巴沙尔下台的示威游行，而且反对派日益形成气候，甚至出现了一些反政府武装组织，由此导致叙利亚和平抗议运动逐渐演变为暴力冲突。2011年7月29日，叙利亚变节军人宣布成立“叙利亚自由军”(Free Syrian Army)，该武装主要由逊尼派穆斯林构成，总部设在土耳其。此后，通过招募其他反政府武装，“叙利亚自由军”成为叙利亚反对派最主要的武装组织。^①2011年8月23日，流亡海外的叙利亚反对派在土耳其的伊斯坦布尔成立了“叙利亚全国委员会”(Syria National Council)，该委员会包括穆斯林兄弟会、知识分子和世俗的政治精英，^②

^① Joshua Landis, "The Syrian Uprising of 2011: Why the Asad Regime Is Likely to Survive to 2013", *Middle East Policy*, Vol. XIX, No. 1, 2012, pp. 74-75.

^② 叙利亚穆斯林兄弟会(下称“穆斯林兄弟会”)自1982年哈马大屠杀后便流亡国外，其在“叙利亚全国委员会”约占25%的席位。Jeremy M. Sharp, Christopher M. Blanchard, "Armed Conflict in Syria: U. S. and International Response", *CRS Report for Congress*, RL33487, July 12, 2012, pp. 29-30.

成为海外影响力最大的政治反对派组织。叙利亚国内也出现了不少反对派组织，其中“地方协调委员会”（Local Coordination Committees）影响最大。巴沙尔继续动用军队镇压抗议运动、打击反政府武装，但成效并不明显。2012年初，叙利亚反对派在获得大量外国资助后逐渐壮大。他们不仅占据了叙利亚的一些中部城市，而且频频制造针对叙利亚政府和安全机构的爆炸事件，政府军也开始围攻这些地区。双方冲突造成严重的平民伤亡。

随着叙利亚局势逐渐失控，外部势力对叙利亚的干涉力度日渐增强。2011年8月中旬，美、英、法等西方国家公开表示，巴沙尔政权已失去合法性，要求其下台，并且加强了对叙利亚金融部门、石油和天然气公司的制裁。^①2011年10月，西方国家试图推动联合国通过制裁叙利亚的决议，为军事干预叙利亚问题寻求合法性，但是遭到中国和俄罗斯否决。西方国家继续支持叙利亚反对派、孤立巴沙尔政权。2012年2月25日，西方国家和部分阿拉伯国家在突尼斯召开“叙利亚之友”国际会议，^②加强对叙利亚反对派的支持和整合，并加紧对巴沙尔政权的制裁。中东国家在叙利亚问题上立场并不一致。阿盟曾就叙利亚问题进行外交斡旋，于2011年11月初提出“阿拉伯倡议”，要求各方停止针对平民的暴力行动、政府军撤出城市、释放政治犯等，并且向叙利亚派遣观察团，但是由于斡旋成效甚微，海湾国家转而推动阿盟中止叙利亚的阿盟成员国资格，还积极为叙利亚反对派提供武器、资金和情报支持。而土耳其和伊朗则分别成为叙利亚反对派和巴沙尔政权的支持者。叙利亚危机日益国际化，并成为中东地区的什叶派和逊尼派之间的争斗。^③

第三阶段为联合国斡旋夭折、叙利亚陷入内战阶段。鉴于叙利亚局势日趋紧张，联合国加强了对叙利亚问题的斡旋。2012年2月24日，联合国任命安南为特使斡旋叙利亚问题，试图通过政治手段解决叙利亚危机。3月末，安南提出“六点和平计划”（内容包括启动叙利亚人主导的包容各方的政治进程、冲突双方停火、释放被捕者、保障民众游行示威的权利等），并获得叙利

^① See Jeremy M. Sharp, Christopher M. Blanchard, "Armed Conflict in Syria: U. S. and International Response", *CRS Report for Congress*, RL33487, July 12, 2012, pp. 35-36.

^② “叙利亚之友”国际会议已召开3次，后两次分别于4月1日和7月6日在土耳其和巴黎召开，未取得积极成效。

^③ Curtis Ryan, "The New Arab Cold War and the Struggle for Syria", *Middle East Report*, Vol. 42, No. 1, 2012, pp. 28-31.

亚各方赞同。4月21日，联合国向叙利亚派遣了由300名非武装人员组成的监督团，监督安南和平计划的实施。叙利亚各派武装停火，叙利亚局势相对缓和。但是，这种脆弱的和平并没能维持多久。5月末，霍姆斯北部胡拉镇发生了大规模屠杀平民事件，叙利亚局势遂急转直下。反对派在叙利亚全国范围内袭击政府军，巴沙尔也宣布镇压反对派。同时，英、法、美、德等西方国家驱逐叙利亚外交官，联合国观察团暂停活动。6月30日，有关各方^①在日内瓦召开叙利亚问题国际会议并通过联合公报，同意叙利亚建立一个包括反对派和巴沙尔政权在内的联合政府。^②安南与巴沙尔也就结束暴力冲突达成共识。

但这些政治斡旋并未缓解叙利亚的紧张局势，7月中旬以后，叙利亚反对派大举进攻大马士革，与政府军展开激战。这是叙利亚危机爆发以来该国第一次陷入战乱，表明叙利亚反对派实力已大为增强，有能力主动打击巴沙尔政权。7月18日，叙利亚国家安全总部遭自杀式炸弹袭击，包括国防部长在内的3名高官身亡，使该国局势更趋恶化。联合国秘书长潘基文8月3日在联大表示，叙利亚危机已经演变成一场代理人战争。叙利亚政府军和反对派双方都摒弃了伸向他们的帮助之手，而显示出了以武力解决问题的决心。^③一直被视为支持巴沙尔政权的首都大马士革和北部城市阿勒颇正在成为叙利亚政府和反对派战斗的中心区。鉴于这种情况，联合国与阿盟叙利亚问题联合特使安南表示，由于叙利亚局势不断军事化，安理会又迟迟无法就这一问题达成一致，导致他无法有效地发挥特使作用，因此，在目前的任期于8月底结束后，他无意继续延长任期。^④安南辞去联合国-叙利亚问题联合特使职务，这将为外部军事力量干预叙危机“敞开大门”。据联合国难民署发布的通告称，冲突已经造成2万多人身亡，逃往邻国寻求庇护的叙利亚民众持续增加。叙利亚已经陷入一场全面的内战。

① 包括联合国常任理事国、阿拉伯国家、土耳其和欧盟，伊朗和沙特被排除在外。

② “Final communiqué of the Action Group for Syria”, June 30, 2012, http://www.unog.ch/unog/website/news_media.nsf/%28httpNewsByYear_en%29/18F70DBC923963B1C1257A2D0060696B?OpenDocument, 2012-7-25.

③ 潘基文：《叙危机已演变成代理人战争》，载中国新闻网：<http://www.chinanews.com/gj/2012/08-04/4082707.shtml>, 2012-08-04.

④ 张杰：《安南称任期于8月底结束后无意延长》，新浪网：<http://news.sina.com.cn/w/2012-08-03/171824902437>, 2012-08-03.

叙利亚政治危机的根源

阿拉伯世界政治动荡以及外部干预固然是引发叙利亚危机的重要原因,但外因总是通过内因才能起作用,叙利亚危机的根源深植于其国内多种矛盾的长期积累。

(一) 巴沙尔经济自由化改革的失败削弱了其政治统治的社会基础

在阿萨德统治时期,尽管叙利亚政权主要由阿拉维派这一少数派把持,但阿萨德通过国有化、土地改革和为社会中下层提供各项社会保障等措施,笼络了叙利亚其他少数民族、农村的逊尼派穆斯林和城市中的逊尼派大商人。^①复兴党政权的社会基础因此较为广泛,这也是1982年阿萨德残酷镇压哈马的穆斯林兄弟会起义后,复兴党政权仍得以续存的重要原因。^②但是,在阿萨德执政中后期,叙利亚的经济发展停滞不前。1981年,叙利亚人口仅为905万,国内生产总值为155亿美元;到2000年,叙利亚人口增至1632万,而国内生产总值仅为173.3亿美元。^③不过,由于存在着较为完备的社会保障体系,叙利亚民众的生活水准并未出现大的倒退。^④2000年巴沙尔上台后,将发展经济视为重中之重,开始加强经济自由化改革。2005年,巴沙尔提出建立“社会的市场经济”(Social Market),即在保持一定程度的国有经济部门的同时,扩大私营经济的比重,放松对外资和金融业的管制,事实上放弃了“阿拉伯社会主义”的经济和社会政策。这些改革虽然在一定程度上刺激了叙利亚的经济发展,但也造成了严重的社会问题。经济自由化改革的主要手段是私有化。在国有企业私有化的过程中,私有经济比重很快超过国有经济。改革的最大受益者是与巴沙尔政权有着密切联系的阿拉维派的大商人和官僚,他们垄断了国家主要的私有经济部门,形成官僚资本。例如,巴沙尔的表兄

① Flynt Leverett, *Inheriting Syria: Bashar's Trial by Fire*, The Brookings Institution Book, 2005, pp. 23-24.

② Raymond Hinnebusch, "The Ba' th Party in Post-Ba' thist Syria: President, Party and the Struggle for 'Reform'", *Middle East Critique*, Vol. 20, No. 2, 2011, p. 110.

③ Volker Perthes, "Economic Challenges and Policy Responses", *The Adelphi Papers*, Vol. 44, Issue 366, 2004, p. 29.

④ Robert Goulden, "Housing, Inequality, and Economic Change in Syria", *British Journal of Middle Eastern Studies*, Vol. 38, No. 2, 2011, p. 195.

拉米·马克鲁夫 (Rami Makhlouf) 控制了包括通讯、石化、金融、零售业和航空在内的几乎 60% 的经济部门。^① 改革造成严重的贫富分化和贪污腐败。叙利亚 5% 的人占有 50% 的国家财富。^② 根据“透明国际”公布的一份报告, 叙利亚的腐败指数在世界 182 个国家中排第 129 位。^③

与此同时, 由于遭受西方国家经济制裁,^④ 叙利亚开始引进海湾国家的资本以推动经济发展, 但这些资本大多流向叙利亚的服务业和房地产业。这种投资不利于叙利亚实体经济的发展和吸纳过剩的劳动力。而随着 20 世纪 80 年代生育高峰期出生的人口步入劳动力市场,^⑤ 叙利亚青年失业率非常高。2011 年叙利亚失业率为 30%,^⑥ 其中男、女青年的失业率分别高达 67% 和 53%, 大学毕业生通常在毕业 4 年后才能找到第一份工作。^⑦ 与此同时, 叙利亚政府却大量削减对教育、住房、医疗、食品、燃油和养老等公共部门的投入, 导致社会下层的生活水平下降。叙利亚有将近 50% 的民众居住在贫民窟, 在大马士革更是高达 70%!^⑧

2006 年以来, 叙利亚连续 4 年遭遇严重旱灾, 其粮食开始依赖进口, 粮食价格不断提高, 这又与巴沙尔的经济自由化改革相叠加, 使叙利亚陷入了严重的经济和社会危机。

总体来看, 巴沙尔的经济自由化改革缺乏渐进性和总体战略, 而且在改革的同时破坏了原有的社会保障制度, 导致经济和社会发展严重脱节, 损害了逊尼派农民和工人的利益, 最终削弱了自身统治基础。

① Michael Peel, "Assad's Family Picked up by the West's Radar", *Financial Times*, April 27, 2011.

② Omar S Dahi, Yasser Munif, "Revolts in Syria: Tracking the Convergence Between Authoritarianism and Neoliberalism", *Journal of Asian and African Studies*, Vol. 47, No. 4, 2011, p. 328.

③ Transparency International, *Corruption Perception Index*, Berlin, 2011.

④ Alfred B. Prados, "Syria: U. S. Relations and Bilateral Issues", *CRS Issue Brief for Congress*, IB92075, March 13, 2006, p. 15.

⑤ 20 世纪 80 年代中期到以来, 叙利亚的人口翻了一倍。See Anna Borshchevskaya, "Sponsored Corruption and Neglected Reform in Syria", *Middle East Quarterly*, Vol. 17, No. 3, 2010, pp. 43-44.

⑥ Jihad Yazigi, "Syrian Unemployment at Twice Previously Estimated Level", *Syria Report*, December 19, 2011.

⑦ James L. Gelvin, *The Arab Uprisings: What Everyone Needs to Know*,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2, p. 108.

⑧ Robert Goulden, "Housing, Inequality, and Economic Change in Syria", *British Journal of Middle Eastern Studies*, Vol. 38, No. 2, 2011, pp. 188, 201.

（二）巴沙尔政治改革的滞后削弱了其对国家的控制力

近代以来，阿拉维派地位低下，一直受雇于逊尼派地主。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法国取得了大叙利亚的委任统治权，开始采取分而治之的政策以削弱阿拉伯民族主义的影响。在这种情况下，阿拉维派成为叙利亚军队的主力，而逊尼派则控制着行政机构。^① 叙利亚独立之后，阿拉维派控制的军方影响逐渐上升。20世纪70年代，阿萨德通过打击复兴党内异己力量、培植亲信和建立多样化的安全部门等措施，强化个人统治，建立了军政合一、以阿拉维派为核心的威权主义政体，实现了叙利亚的稳定。叙利亚由此形成了“少数派统治多数派”的“制度结构”。巴沙尔在继承其父开创的政治制度的同时，却并未继承其权威，以至于巴沙尔执政初期的权力并不稳固。一些来自阿萨德家族和复兴党内部的人挑战其权威，甚至想取而代之。在这种情况下，巴沙尔上台后进行了一系列政治改革，以巩固其统治。其中一项很重要的措施，就是通过迫使复兴党内“元老”退休，以培植亲信、强化个人的权力和削弱改革的阻力。2005年，叙利亚复兴党召开第十次代表大会，阿萨德时期的一些实权人物被迫辞职。据估计，巴沙尔上台后，叙利亚各级政府、复兴党、议会中60%的官员退休。^② 巴沙尔将那些忠于自己、具有改革精神和专业素质的青年官员安插到政府和军队的各部门。巴沙尔的弟弟马赫尔（Maher al-Assad）和姐夫阿瑟夫（Assef Shawkat）^③ 分别被任命为共和国卫队和军事情报部门的领导人。

巴沙尔通过这些举措控制了复兴党，加强了个人权力，但却严重地削弱了复兴党在叙利亚政治体系中的地位，复兴党在高级官员选拔和制定内外政策中的作用逐渐丧失。^④ 此外，尽管巴沙尔提拔的年轻官员大多是阿拉维派，但他们出生于城市，接受西式教育，与阿拉维派部落势力的联系并不强，而且也缺乏政治、军事历练和治国经验。因此，巴沙尔在打击复兴党内异己力量的同时也削弱了复兴党的执政能力。2010年，巴沙尔辞退了一大批复兴党

^① Ayse Tekdal Fildis, "Roots of Alawite - Sunni Rivalry in Syria", *Middle East Policy*, Vol. XIX, No. 2, 2012, p. 149.

^② Shmuel Bar, "Bashar's Syria: The Regime and Its Strategic Worldview", *Comparative Strategy*, Vol. 25, Issue 5, 2006, p. 371.

^③ 阿瑟夫属逊尼派，2011年末被任命为国防部副部长。在2012年7月18日发生的袭击中身亡。

^④ Raymond Hinnebusch, "The Ba' th Party in Post - Ba' thist Syria: President, Party and the Struggle for 'Reform'", *Middle East Critique*, Vol. 20, No. 2, 2011, p. 124.

的基层和中层干部，这些人本来在控制社会和调解族群、部落与宗教冲突中发挥着非常重要的作用。^① 其结果是，复兴党出现了“空心化”趋势。巴沙尔对军方一直心存芥蒂，废除了军人的司法豁免权（Legal Exemptions），并且禁止军方通过商品走私等手段获取经济利益。由于叙利亚的军人收入相对较低，这一措施引发了军方的不满。巴沙尔个人权力的加强是以打破阿萨德所建立的以复兴党为基础的政治体系为代价的，其个人权力只能建立在阿萨德家族和阿拉维派的小圈子之上，由此造成巴沙尔政权统治基础变窄，对社会的控制能力遭到削弱。

巴沙尔在上台之初还进行了一些政治自由化改革。例如，释放 800 多名政治犯，批准建立一些私人的政治论坛，允许反对派回国，缓和与穆斯林兄弟会关系，创办报纸杂志等。叙利亚一些流亡人士将其称为“大马士革之春”。^② 2005 年，巴沙尔批准成立其他政党，但要求这些政党与复兴党结成联盟。事实上，巴沙尔的政治改革只是一种“工具理性”，^③ 他在一次被采访中说得非常明确，“叙利亚没有党派争论，只有一个党的意识形态”。^④ 由此可见，巴沙尔政治改革的目标在于巩固阿萨德家族的统治，而不是去推翻它。当叙利亚国内政治气氛日益活跃时，巴沙尔毫不犹豫地停止了政治自由化的实践。在巴沙尔的改革举措中，经济改革始终是重点，^⑤ 政治制度和行政机制改革则明显滞后，这就导致民众对叙利亚政治体系的忠诚度下降，政治合法性危机凸显。而叙利亚经济改革引发的经济危机传导到政治领域，产生了叠加效应，最终引爆了国内的各种矛盾。

从根本上讲，当前的叙利亚危机源于叙利亚没有形成“一种能不断‘容纳’各种内在于现代化过程之中的社会变迁的制度结构”。^⑥ 正如哈贝马斯所

① Dawn Chatty, “The Bedouin in Contemporary Syria: The Persistence of Tribal Authority and Control”, *The Middle East Journal*, Vol. 64, No. 1, 2010, pp. 29 - 49.

② Najib Ghadbian, “The New Asad: Dynamics of Continuity and Change in Syria”, *The Middle East Journal*, Vol. 55, No. 4, 2001, pp. 637 - 638.

③ 王新刚：《后冷战时代叙利亚复兴党民族主义的特点》，载《西亚非洲》2010 年第 5 期，第 43 ~ 44 页。

④ “Syrian Leader Notes Reform ‘Shortcomings’”, *BBC Monitoring International Reports*, May 3, 2004.

⑤ Ibid.

⑥ [以色列] S. N. 艾森斯塔特著；张旅平等译：《现代化：抗拒与变迁》，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8 年版，第 1 页。

说,社会危机的产生源于“社会系统结构所能容许解决问题的可能性低于该系统继续生存所必须的限度”,即“系统整合的持续性失调”。^①巴沙尔一直处于两难困境:即改变“制度结构”,将瓦解自己的统治基础;否则,又受到边缘化的社会群体的挑战。在叙利亚的社会结构、规范(意识形态)和共识发生解构的背景下,巴沙尔试图通过改革来稳定其统治的做法,也就失去了成功的把握。

(三) 巴沙尔宣扬的阿拉伯主义和叙利亚主义与政治现实相矛盾,导致民族建构以失败告终

叙利亚与伊拉克和黎巴嫩情况相似,民族、教派构成极为复杂。从民族构成看,叙利亚90%的人口是阿拉伯人,其余为库尔德人、亚美尼亚人、高加索人、土库曼人等。从教派构成看,叙利亚74%为逊尼派(8%为库尔德人),13%为什叶派阿拉伯人(阿拉维派占11%~12%,其他为德鲁兹派和伊斯玛仪派)。^②因此,对叙利亚而言,民族建构尤为迫切。阿萨德统治时期,叙利亚以阿拉伯社会主义为纲,通过强调社会的公平正义、外交上的反以、反美和阿拉伯国家的联合,来实现叙利亚民族整合。巴沙尔上台后,继承了其父的民族主义思想,但更强调阿拉伯主义。正如巴沙尔所说:“那些认为我比我父亲温和的人是错误的”,“我们比上一代更认同泛阿拉伯主义。”^③巴沙尔的阿拉伯主义并非要打破阿拉伯国家的疆界,实现阿拉伯统一,^④其最终目的是要强化叙利亚的国内认同,即叙利亚主义(Syrianism)或阿拉伯-叙利亚主义(Arab Syrianism)。为此,巴沙尔政府试图通过强调当代叙利亚与倭马亚王朝、抗击十字军的萨拉丁和抗击蒙古的拜伯尔斯,甚至与罗马帝国的历史联系,强调叙利亚历史文化发展的独特性,以便强化叙利亚民众对于历史和领土的认同,从而强化民族认同。

但是,巴沙尔的这些努力非但没有弥合叙利亚社会的裂痕,反而被严酷

^① [德国] 尤尔根·哈贝马斯著;刘北成、曹卫东译:《合法化危机》,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4页。

^② Flynt Leverett, *Inheriting Syria: Bashar's Trial by Fire*, The Brookings Institution Book, 2005, pp. 2-3.

^③ Eyal Zisser, "Who's Afraid of Syria Nationalism? Nation and State Identity in Syria", *Middle Eastern Studies*, Vol. 42, No. 2, 2006, p. 179.

^④ "Syrian Leader Notes Reform 'Shortcomings'", *BBC Monitoring International Reports*, May 3, 2004.

的政治现实所撕裂。其一，巴沙尔政权仍然由阿拉维派掌控。尽管巴沙尔在公众面前一直强调自身的阿拉伯属性，淡化宗教上的差异，但其权力基础仍然是阿拉维派，^① 特别是阿萨德家族所属的卡拉比亚部落（al - Kalabiyya）。叙利亚的高级军官中90%来自于阿拉维派，他们控制了叙利亚的主要政府部门。而20世纪80年代以来，特别是“哈马屠杀”之后，叙利亚逊尼派的中下层和阿拉维派相互仇视在巴沙尔时期并未缓解。其二，复兴党社会主义破产。巴沙尔削弱了复兴党的地位，并在一定程度上放弃了复兴党社会主义。^② 经济改革及其造成的社会问题，也使复兴党一贯倡导的“均贫富”观念成为昨日黄花。在对外交往方面，2005年叙利亚被迫从黎巴嫩撤军并与以色列进行谈判。这与巴沙尔一直坚持的反以、反美的阿拉伯主义相矛盾，曾经统一和团结叙利亚民众的复兴党社会主义全面解构，叙利亚出现了意识形态的真空。在这种背景下，伊斯兰主义和自由主义日趋填补了认同的真空。也就是说，巴沙尔打破了叙利亚旧的民族认同，但并没有建立起一种新的认同。在叙利亚，复兴党社会主义与伊斯兰主义和自由主义具有竞争性。这3种意识形态往往又和家族、部落、族群和教派认同相互交织，伊斯兰主义和自由主义成为反对阿拉维派独占权力的思想表达，成为政治反对派的主要精神力量。

当前的叙利亚危机本质上是民族建构失败的危机。当年阿萨德通过国家政权的复兴党化、复兴党和安全部门的阿拉维化、权力的个人化和家族化等措施实现了国家的稳定，但他并没能解决叙利亚民族国家建构的根本问题，即如何在具有多样性民族和教派结构的分裂社会实现权力的相对均衡和有效分配，以及如何建构具有全民性的民族认同的问题。而这些问题在巴沙尔时期仍未得到解决，这是叙利亚危机发生的深层原因。

（四）阿拉伯政治认同和外部势力的干涉是叙利亚危机爆发和加剧的直接诱因

2000年以来，从表面上看，叙利亚实现了权力交替，国民经济有所发展。然而，并非如同一些叙利亚官员所说，叙利亚“从未如此好过”。^③ 事实上，

^① 阿拉维派主要由六大部落（al - Khayatin, al - Hadadayn, al - Mutawirah/Numilatiyya, al - Kalabiyya, al - Haydariya, al - Qaratlah）构成。

^② Raymond Hinnebusch, “Syria: from ‘Authoritarian Upgrading’ to Revolution?”, *International Affairs*, Vol. 88, No. 1, 2012, p. 98.

^③ Eyal Zisser, “The ‘Struggle for Syria’: Return to the Past?”, *Mediterranean Politics*, Vol. 17, No. 1, 2012, pp. 106 - 107.

叙利亚国内危机四伏。例如,2004~2005年,叙利亚的阿拉维派、伊斯玛仪派、库尔德人之间发生多次流血冲突。2005年,叙利亚国内反对派发表了《大马士革宣言》,要求巴沙尔进行民主改革。一些强硬派甚至要求巴沙尔下台。^① 叙利亚已经到了变革的临界点。

阿拉伯政治具有的传导性使叙利亚国内的经济和社会问题最终转化为政治危机。阿拉伯政治认同并未随着阿拉伯民族主义的退潮而削弱。这种认同基于阿拉伯民众共同的政治信念和命运,以及阿拉伯国家存在着共同问题。当前,阿拉伯民众对民主和公平的追求,已成为当代阿拉伯世界一种新的政治认同。^② 正是这种政治认同使其他阿拉伯国家的政治动荡与叙利亚国内问题产生共振,最终引发叙利亚危机。然而,由于极其重要的地缘政治地位和教派矛盾,叙利亚危机比其他的阿拉伯国家表现的更为剧烈。

叙利亚地处中东的“心脏”,既是西方国家觊觎的对象,也是中东地区什叶派和逊尼派争夺的焦点。长期以来,美国一直将叙利亚视为“无赖国家”。伊拉克战争之后,美国陆续通过了多项制裁法案,对叙利亚进出口、外国投资和金融部门进行制裁,^③ 并且公开支持叙利亚反对派。美国试图借此颠覆复兴党政权,使叙利亚成为其“大中东计划”的另一块拼图。此外,叙利亚在西方国家打压下,日益加强与伊朗的联系,成为伊朗在黎巴嫩扩展影响的中介,与海湾君主国的关系恶化,后者试图孤立叙利亚,剪除伊朗的“羽翼”。^④ 此外,叙利亚与土耳其关系也充满变数。2002年土耳其正义与发展党上台后,在中东推行“零问题”外交,叙利亚和土耳其关系逐渐摆脱之前库尔德人问题的阴影,两国关系得到改善。然而,阿拉伯国家的政治动荡为土耳其扩大在中东影响力,乃至填补中东权力真空带来契机。^⑤ 因此,土耳其开始支持叙利亚的伊斯兰主义反对派,以强化“土耳其模式”在中东的影响力。

① See Shmuel Bar, “Bashar’s Syria: The Regime and its Strategic Worldview”, *Comparative Strategy*, Vol. 25, Issue 5, 2006, pp. 397–402.

② 参见 [美国] F. 格里高利·高斯三世著; 闫伟译:《中东研究缘何错失阿拉伯之春》,载《国外理论动态》2012年第7期,第86~87页。

③ Jeremy M. Sharp, “Unrest in Syria and U. S. Sanctions Against the Asad Regime”, *CRS Report for Congress*, RL33487, August 9, 2011, pp. 24–30.

④ Frederic Wehrey, *Saudi – Iranian Relations since the Fall of Saddam*, RAND Corporation, 2009, p. 89.

⑤ Robert Malley, Karim Sadjadpour, Ömer Taspmar, “Israel, Turkey and Iran in the Changing Arab World”, *Middle East Policy*, Vol. XIX, No. 1, 2012, pp. 9–12.

因此，叙利亚发生危机后，西方国家和沙特、土耳其等邻国积极插手叙利亚事务，不遗余力地支持叙利亚反对派（主要是逊尼派），力促巴沙尔下台。与其他经历动荡的阿拉伯国家相比，叙利亚问题不仅具有更为复杂的历史根源，而且还与外部势力相互交织，严重地加剧了叙利亚的危机。

叙利亚未来政治生态研判

无论叙利亚内战的结果如何，复兴党垄断叙利亚政权的局面将一去不返，叙利亚各派政治势力将进行新一轮的“洗牌”，其国家建构的前景存在诸多的不确定性。

（一）叙利亚主要政治派别

尽管在叙利亚国内也存在着阶级分化和国内外政治力量的差别，但叙利亚具有的“马赛克式”的族群和教派结构成为叙利亚未来政治生态的基本拼图。叙利亚的政治力量主要由以下几部分构成。其一是叙利亚流亡海外的反对派。其中，穆斯林兄弟会是最为强大的一股力量。在叙利亚政治危机爆发之初，穆斯林兄弟会主张通过和平和对话的方式解决危机。^① 随着叙利亚危机的持续发酵，穆斯林兄弟会转而主张推翻巴沙尔政权，并且积极要求西方国家干涉。2012年3月，穆斯林兄弟会通过了新章程，说明了未来的政治构想。主要有：世俗国家和世俗宪法、多元民主的代议制共和国、三权分立、人人平等、保障个人的基本权利、各民族和教派都应具有代表性等。^② 可以看出，与其他阿拉伯国家不同，穆斯林兄弟会并没有强调伊斯兰教在未来叙利亚的政治地位。这主要是因为叙利亚复杂的教派和民族构成使伊斯兰教不仅无法成为动员民众的力量，反而可能加深社会隔阂。叙利亚存在着相当数量的基督徒，逊尼派一直将包括阿拉维派在内的什叶派视为异端。实际上，20世纪80年代以后，穆斯林兄弟会在流亡海外期间已经改变了他们的政治主张，开始淡化伊斯兰色彩，并与叙利亚世俗反对派合作。^③ 由此可见，穆斯林兄弟会

① “Syria – Muslim Brotherhood”, *The Middle East Reporter (Beirut)*, July 8, 2011.

② “The Muslim Brotherhood in Syria: Covenant and Charter”, <http://asenseofbelonging.org/2012/07/03/the-muslim-brotherhood-in-syria-covenant-and-charter>, 2012-08-04.

③ Yvette Talhamy, “The Muslim Brotherhood Reborn”, *Middle East Quarterly*, Vol. 19, No. 2, 2012, pp. 34-36.

主张相对温和的伊斯兰主义，试图通过移植“土耳其模式”在叙利亚重建逊尼派主导的政治秩序，也就是说，穆斯林兄弟会的政治主张相对灵活和成熟。此外，穆斯林兄弟会得到土耳其、沙特、卡塔尔等国的支持，控制了叙利亚的主要反对派“全国委员会”^①，并与“叙利亚自由军”联系，负责向后者发放资金和武器。穆斯林兄弟会很可能成为下一个上台的伊斯兰政党，是塑造未来叙利亚政治的最重要的一股政治力量。

然而，穆斯林兄弟会也存在缺陷。与埃及和突尼斯等具有较高同质性的国家不同，尽管穆斯林兄弟会表示在新的政治体系中将会包容包括阿拉维派在内的什叶派、基督徒和库尔德人，^②但后者仍然对其有所顾虑。而且穆斯林兄弟会在海外流亡近30年，在叙利亚国内并没有建立组织机构。即使在逊尼派内部，穆斯林兄弟会只是在贫民和青年当中具有一定的影响力，而叙利亚南部的贝都因人部落和城市中的自由主义者对其并没有好感。^③一些叙利亚国内的反对派甚至认为，“穆斯林兄弟会是要通过‘全国委员会’窃取革命果实。”^④根据民意调查，在黎巴嫩的叙利亚难民中，对于“穆斯林兄弟会”的认可度排在所有反对派的第八位！^⑤穆斯林兄弟会只是当前叙利亚最强大的反对派，但很难成为一股垄断性的力量。穆斯林兄弟会的一位领导人德鲁比（Molham al - Drobi）甚至悲观地认为，如果叙利亚举行民主选举，穆斯林兄弟会只能得到25%的选票。^⑥

其二是叙利亚国内的反对派。叙利亚国内政治反对派大致可以分为5种类型：左翼反对派（社会主义者和纳赛尔主义者）、草根阶层、知识分子、保守的伊斯兰主义者和萨拉菲主义者。^⑦除萨拉菲主义者外，其他的反对派大多

① “全国委员会”主要由穆斯林兄弟会、世俗反对派、少数民族（主要是库尔德人）和“地方协调委员会”构成，各派政治主张严重分裂。但叙利亚国外的反对派，特别是穆斯林兄弟会处于主导地位。

② “Syria’s Muslim Brotherhood Leader Mulls Post - Asad Country”，*BBC Monitoring International Reports*, September 7, 2012.

③ “Comment Mulls Muslim Brotherhood’s Chances of Taking over Syria’s Leadership”，*BBC Monitoring International Reports*, July 21, 2012.

④ Elizabeth O’ Bagy, *Syria’s political Opposition*, Institute for the Study of War, 2012, p. 16.

⑤ The International Republic Institution, *Survey of Syrian Refugees in Lebanon*, Washington, DC, 2012.

⑥ Liz Sly, “Syria’s Muslim Brotherhood is Gaining Influence over Anti - Assad Revolt”，*The Washington Post*, May 13, 2012.

⑦ Ignacio Alvarez - Ossorio, “Syria’s Struggling Civil Society”，*Middle East Quarterly*, Vol. 19, No. 2, 2012, p. 27.

由逊尼派阿拉伯人构成。叙利亚国内的伊斯兰主义者和知识阶层的影响并不大。叙利亚国内的反对派具有世俗化和平民化的特点。其中，左翼反对派主要隶属于“全国协调委员会”。后者是一个植根于叙利亚国内的全国性反政府组织。“全国协调委员会”主张与巴沙尔政权进行对话和政治解决叙利亚问题，反对武装推翻巴沙尔政权以及外国的军事干涉。正是因为这种温和的立场，“全国协调委员会”受到其他反对派的孤立，影响力有限。2012年9月末，该委员会不仅承认“叙利亚自由军”，而且要求推翻巴沙尔政权，反对库尔德分离主义。

叙利亚政治危机源于国内抗议运动，其参与者主要是叙利亚社会中下层的青年。他们最初要求巴沙尔进行政治改革、废除“紧急状态法”、实行多党制，并不主张通过暴力方式颠覆复兴党政权。但复兴党对于抗议运动的武力镇压使抗议者的立场发生转变，开始要求推翻复兴党政权。叙利亚国内的抗议者也形成了一定的组织机构，在一些地区成为“影子政府”。在基层，叙利亚的抗议者建立了“地方协调委员会”，负责组织抗议运动。在省级和全国形成了“革命委员会”和“革命总委员会”负责协调叙利亚国内的反政府运动。^① 尽管这些机构之间存在着一定的隶属关系，但组织并不严密。一些抗议者甚至不知道革命委员会为何物。^② 叙利亚的青年抗议者除了要求推翻复兴党政权、建立多元民主制度、反对外来干涉之外，并没有明确规划未来叙利亚的政治前景，而且也缺乏政治经验。因此，这些青年是决定叙利亚政治前景的民意基础，但却很难成为领导力量。

叙利亚国内还存在着主要由“叙利亚自由军”^③组成的军事反对派，据估计约有6万人，^④ 主要包括位于中部霍姆斯省的“哈立德·本·瓦利德旅”（Khalid bin Walid Brigade）、东北部扎维亚山区（Jebel al-Zawiya）的“哈默斯营”（Harmoush Battalion）以及南部地区德拉省的“欧玛里营”（Omari Battalion），主力集中在叙利亚中部地区。^⑤ “叙利亚自由军”并不是一个统一的组织，内部同样存在着分裂。正如美国国防部长帕内塔所说，叙利亚“军事

① See Elizabeth O' Bagy, *Syria's Political Opposition*, Institute for the Study of War, 2012, pp. 20 - 27.

② Ibid., p. 27.

③ 2012年9月底，“叙利亚自由军”的总部已由土耳其迁往叙利亚。

④ Oren Dorell, “Syrian Rebels Want Democracy, Islamic-Style”, *USA Today*, September 24, 2012.

⑤ See Joseph Holliday, *Syria's Armed Opposition*, Institute for the Study of War, 2012, pp. 10 - 30.

反对派的成分并不明了，（美国政府）无法承认、指定和联系具体的反对派”^①。“叙利亚自由军”主张推翻复兴党政权，建立自由和民主的共和国和多元社会，保障民众的基本权利等。尽管“叙利亚自由军”在名义上隶属于“全国委员会”，事实上不仅是军事反对派的主力，具有很强的政治影响力。根据美国的民调显示，34%的叙利亚反对派认为“叙利亚自由军”是叙利亚人民合法代表，支持“全国委员会”的仅为23%。^②在叙利亚未来的政治图谱中，“叙利亚自由军”、“全国委员会”和“地方协调委员会”是叙利亚最具影响力的三大政治力量。

其三是叙利亚的少数民族和少数教派。在叙利亚的逊尼派阿拉伯人存在严重分裂的情况下，少数民族和少数教派的政治立场对于叙利亚未来政治发展的影响尤为重要。分布于叙利亚东北部的库尔德人是叙利亚最大的少数民族。但在历史上，复兴党政权并不承认库尔德人的民族地位，将近30万外来的库尔德人移民无法获得公民权。此外，复兴党还强制推动库尔德人的阿拉伯化，禁止使用和教授库尔德语，并且向叙利亚与土耳其的边界移民建立所谓的“阿拉伯地带”，以阻隔两国库尔德人。因此，库尔德人与复兴党政权的关系一直不睦。2004年，叙利亚爆发了阿拉伯人和库尔德人的冲突，导致后者死伤数百人。叙利亚危机发生后，复兴党授予20多万库尔德人公民权，^③并与库尔德民族主义者达成默契。反对派也竭力拉拢库尔德人，2012年6月，“全国委员会”选举库尔德人西达（Abdelbaset Sieda）为领导人。但绝大多数的库尔德民族主义党派都持观望的立场。2011年7月，巴沙尔调离驻扎在库尔德人聚居区的政府军，库尔德民族主义政党接管了该地区的大部分政权。叙利亚库尔德地区处于自治状态。尽管叙利亚的库尔德民族主义政党有10多个，政治主张也并不完全一致。但总的来看，叙利亚的库尔德人主张地区自治，要求承认其民族地位和基本权利，通过民主的方式解决叙利亚问题，建立世俗的共和国。^④因此，叙利亚库尔德人的目标是建立伊拉克式的联邦制，而非建立一个独立的库尔德人国家。可以说，库尔德人不仅是打破叙利亚冲

① Leon E. Panetta, “Statement on Syria before the Senate Armed Services Committee”, March 7, 2012, <http://www.defense.gov/speeches/speech.aspx?speechid=1660>, 2012-09-20.

② The International Republic Institution, *Syrian Opposition Survey*, Washington, DC, 2012.

③ Zeina Karam, “Syrian Kurds Grab Control in Northeast”, *Toronto Star*, August 24, 2012.

④ KurdWatch, *Who is the Syria - Kurdish Opposition?*, Berlin, 2011, pp. 16-17.

突双方实力平衡的重要力量，也深刻地影响着叙利亚未来的政治发展和地区安全。

叙利亚的基督徒和德鲁兹派是复兴党政权的重要支柱，他们中的一些人在军政部门担任要职。^① 例如，2012年7月遇袭身亡的叙利亚国防部长拉杰哈就是基督徒。一旦复兴党政权倒台，叙利亚的少数教派可能沦为“二等公民”，甚至遭致极端主义者的报复。因此，尽管部分的基督徒和德鲁兹人公开反对复兴党政权，但大多数人仍然反对叙利亚内战。正如叙利亚的一些基督徒所说，我们支持的是国家稳定，而不是复兴党政权。^② 阿拉维派无疑是复兴党政权的核心。阿拉维派各大部落相互通婚、联系密切，其中有70多万阿拉维人供职于复兴党的军队^③。尽管叙利亚反对派声称其目标是推翻复兴党的统治，并不是针对阿拉维派。但叙利亚冲突已演变成教派冲突，阿拉维派的地位首当其冲地受到威胁。因此，绝大多数阿拉维派仍然支持复兴党政权。尽管阿拉维派在叙利亚已经日渐孤立，从长期来看很难继续独揽大权，但阿拉维派拥有很强的军事力量和生化武器，阿拉维派的政治前途在很大程度上仍然决定着叙利亚未来的安全状况。

（二）叙利亚未来的政治图景

从以上分析可以看出，叙利亚国内政治存在严重的碎片化特征，各个政治派别都存在着一定的缺陷。因此，在后复兴党时期，叙利亚不大可能出现某一个政治派别独大的局面。不同政治派别之间的角力和外部势力的干涉将共同绘制出叙利亚未来的政治图景。

2011年以来，中东国家政局动荡的一个显著特征就是温和的伊斯兰力量颠覆传统的民族主义政权，纷纷效仿“土耳其模式”^④。但是，叙利亚是一个民族和宗教具有严重异质性的分裂社会，而且也是一个世俗化程度较高的国家，阿拉伯民族主义就发源于此。因此，伊斯兰教和阿拉伯属性在叙利亚未来国家建构中的作用并不是完全积极的。在历史上，叙利亚国内关于伊斯兰

① Shmuel Bar, "Bashar's Syria: The Regime and Its Strategic Worldview", *Comparative Strategy*, Vol. 25, Issue 5, 2006, pp. 396-397.

② "Syria's Christians Support Stability, not Assad's Regime", *AlArabiya.net*, September 5, 2012.

③ Paul McGeough, "Assad's Alawites Run out of Options", *The Sun Herald (Sydney)*, August 12, 2012.

④ 参见王林聪：《“土耳其模式”的新变化及其影响》，载《西亚非洲》2012年第2期，第82~97页。

教能否作为国教和叙利亚国家的阿拉伯属性就存在着非常大的争议。什叶派和基督徒被逊尼派视为异教徒。叙利亚的1973年宪法并没有将伊斯兰教规定为国教,但却突出自身的阿拉伯国家的地位。^①这就使得复兴党在团结叙利亚少数派的情况下,也伤害了库尔德人的利益。从现实来看,叙利亚主要的伊斯兰力量穆斯林兄弟会在叙利亚国内并没有广泛的群众和组织基础,特别是叙利亚的主要军事反对派“叙利亚自由军”是世俗力量。因此,叙利亚未来不大可能如同突尼斯和埃及那样出现穆斯林兄弟会一党独大的局面,可能出现的是利比亚那样的宗教与世俗力量势均力敌的局面。但伊斯兰教的地位^②和阿拉伯属性将是未来叙利亚政治中矛盾的焦点之一。

族际和教派关系的重构是叙利亚未来政治发展面临的最为迫切的问题。从民族国家的类型上看,叙利亚属于有核心(逊尼派)的多民族国家。复兴党政治体制的症结就在于“核心的边缘化”。叙利亚危机在很大程度上是这种权利结构的危机。因此,在叙利亚的未来政治图景中,旧的权利结构势必被打破,需要建立一种基于民主制度的新型族际关系。即后者应当承认少数民族的地位和权利,而不是以所谓的“公民权利”去模糊族裔差别。^③如今,叙利亚主要的政治派别都表示接受多元民主的政治制度以及保障少数民族和教派的权利,但这远远不够。从制度层面来看,叙利亚需要建构一种能够有效维护少数民族和教派权利的制度模式。这涉及到叙利亚的少数派在未来的政治制度中是否具有代表性,以及建立联邦制还是单一制的问题。这实际上是一个“共治”与“自治”的问题。在叙利亚冲突中,叙利亚库尔德人已在伊拉克的影响下组建自治政府,阿拉维派拥有较为强大的武装力量,而且在上个世纪20年代也有过建国经历。一旦复兴党政权崩溃,叙利亚虽然不大可能出现分裂,但隐含在族裔矛盾之上的政治制度之争,以及能否把复兴党残余力量纳入政治重建进程是影响叙利亚未来政治发展的又一焦点。因为从根本上讲,只有实现民族和教派的和解与共同发展,叙利亚政治发展才有可能实现超越。

① See The World Law Guide, “Syria Constitution 1973”, <http://www.servat.unibe.ch/icl/sy00000.html>, 2012-09-12.

② 根据一份民调,叙利亚反对派中认为宪法、政府和学校课程要基于伊斯兰教的得分只有4.43分(满分为7分)。See The International Republic Institution, *Syrian Opposition Survey*, Washington, DC, 2012.

③ 参见王建娥著:《族际政治:20世纪的理论与实践》,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1年版,第274~286页。

地缘政治同样会严重的影响叙利亚未来的政治发展。叙利亚冲突已演变为地缘政治博弈，西方国家和其他的中东国家都试图从叙利亚政治变迁中获得私利。如今，叙利亚已成为中东逊尼派和什叶派博弈的焦点。西方和其他中东国家都在叙利亚寻找自己的“代理”。例如，叙利亚的什叶派获得伊朗、黎巴嫩真主党和哈马斯的支持；而西方国家、海湾国家、土耳其、埃及、约旦、利比亚等国则支持逊尼派。即使后者也存在着分歧，美国对叙利亚穆斯林兄弟会仍有顾虑，并未向其提供军事支持；沙特和卡塔尔分别支持“全国委员会”和“叙利亚自由军”；土耳其支持叙利亚反对派，并成为后者的大本营。然而，这些国家的政治主张并不一致，有些甚至是南辕北辙。这势必加重叙利亚的政治分裂和与伊朗核问题、黎巴嫩问题、伊拉克问题等地区热点问题的关联程度，使叙利亚国内政治国际化和“黎巴嫩化”。当然，在基地组织向叙利亚渗透、库尔德问题、难民问题和地区安全环境恶化的情况下，叙利亚的问题显得尤为重要。因此，对于叙利亚问题来说，外部势力不仅有斗争的一面，而且也存在着合作。总的来看，外部势力的介入使叙利亚的政治前景更加复杂，各种不确定性显著增加。

叙利亚的政治前景在一定程度上也依赖其经济状况能否改善。政治危机爆发以来，叙利亚经济发展受挫。2012年，叙利亚国内生产总值预计减少10.2%，工业产能减少18.9%，通货膨胀率高达34.2%。^① 叙利亚的人均国内生产总值排在中东所有国家的倒数第三位，仅高于也门和苏丹。更为严重的是，战乱导致叙利亚的基础设施破坏严重、资本外流、旅游业遭受重创，特别是占叙利亚政府收入近一半的石油部门严重衰退。根据英国石油公司统计，1999年，叙利亚石油的探明储量为30亿桶，2011年降至25亿桶；日产量由2001年的58.1万桶锐减至33.2万桶。^② 如今，叙利亚的石油产量已难以自给。因此，复兴党政权倒台与否并不能构成叙利亚经济改善的充分条件，反而政治动荡会进一步加剧叙利亚的经济困难。叙利亚的经济前景不容乐观制约着政治发展。

综上所述，尽管叙利亚政治发展存在诸多不确定性，但是复兴党独掌大权的局面将被打破。叙利亚社会将沿着民族和教派的界线发生裂变，没有一

^① Economist Intelligence Unit, *Country Report: Syria*, London, August 2012, pp. 7-8.

^② BP, *BP Statistical Review of World Energy*, June 2012, pp. 6, 8.

股力量有能力成为独占的统治力量。民族和教派冲突将成为叙利亚的政治标签，也可能变成下一个伊拉克。如同其他的后冲突国家一样，叙利亚也将由复兴党统治下的“强国家”变为“弱国家”。叙利亚的未来不仅决定于叙利亚能否创制出适合国情的制度文明和实现民族和解，更决定于国际社会的作用。

The Causes of Syria Crisis and Its Political Scenes in the Future

Yao Daxue & Yan Wei

Abstract: Conflict in Syria is intensifying and increasingly falling into the civil war since the crisis broke out in the country. To some extent, the crisis is a result of foreign factors, but the main reason is the defects of Syria's internal and foreign affairs. The economic and political reforms implemented by Bashar al - Asad not only fail to save Ba'ath regime, but sharpen the social conflict and weaken the foundation of the regime. There's a political conductivity in Syria which comes from Arab political identification. Syria is isolated by Western and Gulf countries owing to its pro - Iran foreign policy. Political scenes of Syria are likely to go to fragmentation in the long run, and there will be no political faction can monopolize the power. Conflicts between Islam and secularism, federalism and unitary system, and the Kurdish issue will happen among political factions in Syria. The future of Syria not only depends on whether Syria can create a political system based on its national conditions and national reconciliation, but also depends on the role of international community.

Key Words: Syria Crisis; Bashar al - Asad; Political Scenes

(责任编辑:樊小红 责任校对:詹世明)